

文章写好不容易。如果篇篇皆好，则是难上加难的事情；而若几十年来平均每周都要作文一篇，那则更是非同寻常，乃或堪为奇迹了。印象中董桥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曾先后写就了近2000篇的文章，开设过“英华沉浮录”、“苹果树下”等多个很有影响的专栏，可谓笔耕勤，著述颇丰。可惜年来他以《珍重》为文，向读者告别，也向自己经营多年的小品专栏道别。之前的董桥，每周一篇的专栏文章，早已成为海内外很多华人读者的一种期待。如今，这道清雅的文化风景终于也成为了旧时的一抹月色。

其实，追寻和探究有关董桥的文章之道，我以为不妨从其自编的文集入手。董桥自编文集总计近30种，其中除去几册话题相近的文集之外，其他集子大多都是每隔一段时间，便将专栏文字集结而成，也多是篇幅不厚的小册子，这做法真有些知堂老人的风味。记得最早读董桥的文集是《英华沉浮录》，内地初版以《语文小品录》为名出版，也是恰切。《英华沉浮录》原系董桥所撰写的同一个话题专栏，但现在看来也是最见神采。后来的《绝色》和《小风景》，则见其情趣和识见；而《从前》与《记得》等集子，则显出沧桑与老辣。

读书多与追求相关，董桥的这几册《英华沉浮录》，探讨的恰是这个问题，而且他所关注的问题更为超前和现代，因为那些问题都是在香港这样洋杂处的现代情景之中。写作“英华沉浮录”时的董桥，文章常常从读书读报中寻找话题，或赞赏，或指谬，或谈自己的见解，都是颇有见地的杂文短章。仿若香港文化的啄木鸟，又若是中国文化的布谷鸟。香港真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在这里，闽南语、普通话和西洋语互相交织，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风景，但在董桥的眼里，则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家，他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创作。若谈他的文学史地位，当然并非乏善可陈，他亦有自己的位置。然而在文学上，他不够独特。最独特的，是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晚年。人生或许难论成败，然而像章克标这样，有惊无险，伏倒再起地度过漫长一生，肯定是非常难得的。在现代作家中，他肯定不是写得最好的，但肯定是最长寿的。他以风趣幽默著称，但笔调的幽默感不趣口头的。老舍也幽默，但那幽默里总带着沉郁，回味有丝苦味萦绕不去。章克标的风趣，则是海派的，看穿世事，老于世故，游刃有余，一笑解千愁。文中照眼，或许长寿与否，晚景如何，早有蛛丝马迹可寻。

章克标，1900年7月26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长云镇，字恺熙。1918年从嘉兴的浙江省立二中毕业后获官费赴日留学机会，第二年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算学。同校有田汉、方光焘等人，与郁达夫、滕固交往密切。在日本时就开始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处女作，从此开始文学创作。1925年回国后在浙江省立六中、二中、杭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立达学园及国立上海暨南大学理学院等处任数学老师。然而他虽然教数学课，却以文艺知名。1926年在上海与胡愈之、丰子恺、叶圣陶等人共同轮值主编《一般》月刊。又和滕固、方光焘、张水淇、黄中等十多人结成狮子社，参与编辑同人杂志《狮子》，帮办金屋书店。1930年前后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两年，又主编数学教科书，又主编《开明文学词典》。自1932年起担任了3年上海时代图书出版公司总编辑兼代经理。他还与林语堂、邵洵美、李青崖、全以嘏等创办《论语》半月刊，据他晚年回忆，《论语》之名就是他灵机一动的产物。他有大量作品发表在《小说月报》等处，译作更是常见于各种杂志。他在《申报·自由谈》以“岂凡”之名发表了大量杂文。1936年左右在嘉兴的浙江省立二中任教，曾是金庸的数学老师。抗战爆发后回到上海，1939年冬进入《中华日报》社翻译日文资料，曾任汪伪宣传部科长，还是《南京新报》(后改为《民国日报》)的主笔，之后又赴杭州任伪《浙江日报》总编辑、代理社长直至1944年。之后一直在海宁隐居。1952年任上海少儿读物出版社联合书店出版部主任，后到新华书店上海发行店主持创作工作。1956年调上海印刷学校，主持编译室，翻译编辑印刷技术教材。1958年被判处三年管制，开除公职。1980年由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聘为馆员。2007年1月23日，以108岁高龄在上海逝世。

说起章克标，人们常想到他是金庸的老师。他的确曾任金庸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金庸对他的言语风趣印象很深。章克标后来以百岁之龄再婚，金庸送了贺信及贺礼。章克标的回忆录《世纪挥手》也由金庸题名。

不过以章克标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地位，其实完全用不着以金庸的中学数学老师这一身份作为注脚。他在日本深受谷崎润一郎和新感觉派的双重熏陶，是唯美和唯乐小说的代表作家。研究“狮子”、“金屋”，章克标是个绕不开的作家。纯粹从文本上来说，他当然写不过圣手穆时英，与科班出身的邵洵美也有很大差距，也不如滕固的文本内涵那么复

# 苍苍横翠微

□朱航满

是他对纯正的传统汉语与典雅的英语魅力的叹服与评析。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夏济安翻译的《名家散文选读》的赞叹，乃是“中英文富可敌国，进出衣香鬓影之间应对得体，十足外交官风度”。夏济安是杰出的学者，英语和中文造诣皆深，他翻译的《名家散文选读》既得汉语文章的典雅精简，又得英语文学的神韵妙境，即使略有瑕疵，也是“珠玉纷陈之中不忍心在小处挑剔了”。

虽说董桥不是诸如夏济安这样专业的研究者，但在他的只言片语中，却能发现两人的暗通款曲之处。早年董桥也曾因谋生而做过翻译的差事，又曾在英国伦敦的亚非学院坐过冷板凳，对于英国的语言文学下过很深的功夫，故而深得英语文学的妙处。他多次坦言，写好中国文章，熟悉一到两门的外语是很有益处的，为此，他极为欣赏诸如夏志清、余英时、刘绍铭、金耀基、余英时这样十分现代的“国际型”学者，皆因他们能够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由地游戏。在董桥的文章之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标志便是他引用英文华章的精彩片段，往往是直接引用原文，不翻译，或只评点，竟颇有些相得益彰的味道。他解释说这便是英文带有英文的味道，若译成中文就变调了，失去了本身的音乐感。文学评论家黄子平编选董桥文集《旧日红》，也曾注意到这个特点，他说董桥是绝不放过同时呈现两种文字之美的可能，乃是给自己立标准，依了这内在的标准，方能笔顺无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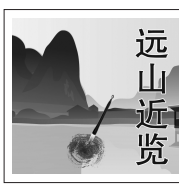
碍，写得自由自在。可以说，董桥的理想读者，应也是能够熟悉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同道之人。

董桥早年写书法，写文评，写随笔，笔底有明清书风的风味，也有兰姆、伍尔夫、毛姆这样的英伦神韵。在董桥的文集之中，有关谈书的文章颇为不少，诸如他谈书的作者、内容、观点，更谈书的装帧、版本、插图以及藏书票等，皆有趣味也有情调。知堂的书话文章多注重明清笔记杂著、风俗旧谈，也常提及域外书籍，但可谈的又多是常见的大路货，能给人以知识和情趣。董桥的书话文章便是以谈英伦旧书为特色，最为代表的便是他的集子《绝色》。此书以一文一图的形式写了自己所藏的英国文学的旧籍与珍本，许多还是十分罕见的版本，令人赏心悦目。用“绝色”来称赞这些珍藏旧书的版本和装帧，乃是十分恰切的。诸如他曾津津乐道的一册1910年版的《鲁拜集》手抄影印本，据言乃是莫里斯手工艺的承袭，描金七彩花饰描画起首字母再配上彩图，十分考究，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堪可止渴”。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当代能作西文书话者不少，但藏有诸多西文珍本并写一手漂亮文章的人，还是少见的。

愈到晚年，董桥则愈眷恋旧时的文玩。他对于张充和的书法、傅心奋的国画、梁启超的遗墨、沈从文的条幅等文人笔墨的欣赏和赞叹，让人印象深刻。由此后来甚至写他所收藏的一些文房小

品，若以一文一图的形式出现在专栏之中。诸如字画、木刻、竹器、漆盒、铜雕、玉器等等，也都是文人把玩的小物件，精致清秀，令人爱慕。对于董桥来说，每一种文玩都是一种生命、一种经历、一种文化、一种寄托，在他的笔下——道来，晚岁董桥这样的文章写得最多。其实，董桥并非专业的鉴赏家，也并非倾心文玩旧物的老学究，他笔下文字是对旧时月色的喟叹与爱慕，也是对逝去文化的追怀与思恋。友人张瑞田研究书法，曾写过一篇文章为《董桥谈字》，以为董桥若具体谈论书法，便常有破绽，不过其间却闪烁才子的灼见，有些还堪称“当代书论的华彩乐章”。想来董桥谈字，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政治劫难之后，“值得依恋的正是这些残留的旧时月色”，他爱的不仅仅是物质，而是物质所承载的传统精神。

就人而言，董桥并非只写那些清贵的文化名流，他所写的那些隐没民间的文人，也是令人叹服的。诸如《亦梅先生》《云姑》等篇章，均是写亲人故友的人生，他们的爱好、他们的追求以及他们的命运，背后更是一种文化的衰落，一种世道的叹息，以及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苍黄之变。诸如他笔下的薇姨，从泉州到香港，干粗活，做下女，没想到他偶然听到了薇姨弹奏肖邦小夜曲的钢琴声，灵巧又婉约；还有他笔下的云姑，流落海外，命运多舛，但倾心的依然是契诃夫笔下的短篇小说。由此也记得他曾在《寂寥》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感慨：“他们的笑声和泪影，毕竟也是不带繁华的笑声，不带着璀璨的泪影。他们的故事，于是也只能像乾坤几笔写意的山水：传统的安分中透着潜藏的不羁，宿命的无奈里压住澎湃的不甘；纵然是刹那的魅力，预卜的竟也是阶前点滴到天明的凄冷。”



# 章克标：长寿是福

□郑绩

杂，但是章克标有很强的活动能力，狮吼的发展邵洵美固然是灵魂，但章克标所起的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创作而言，在唯美颓废一路上，章克标有他的独特性。他还有许多翻译作品，日语之外尚学习法语，并试译过不少文学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

章克标出的书不少，以他的写作路子，销售情况当然很一般。惟有《文坛登龙术》一印再印，大受欢迎。除了写唯美小说，章克标也走愤世嫉俗的路子。他有长篇小说《银蛇》，厚达400多页，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事为原型写就，满满颓废文人的酸气，颇有挖苦之意。在《一般》和《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数量众多，因此也有人称他为杂文家。不过他的杂文从根子上缺乏批判精神，写不过左翼阵营的那些杂文作家，数量虽不少，却是无趣的多，只能看出他也有一腔不平想要倾吐。《文坛登龙术》顾名思义，就是不点名地写种种文坛怪现象，因为并不指名道姓，反倒放开笔墨，十分痛快，当然也非常畅销。他还在《十日谈》辟有“文坛画虎录”，也是嘲骂文坛人物。

章克标曾在陶元庆引见下拜访过一次鲁迅，气味不相投，再无交往。鲁迅很不喜欢章克标的笔墨，认为他“颇恶劣”，将他认作邵洵美的帮闲，很是写了七篇文章将他与邵洵美讥讽了一番。晚年章克标说起这一段，总觉自己是被邵洵美连坐，亦觉得鲁迅“神经过敏”。实则鲁迅与邵洵美虽有误会，却更是因为不是同道中人。

章克标一向很有广告意识。他在《论语》半月刊上为《文坛登龙术》所做的广告就非常吸引人，也引起鲁迅关于“富家女婿”的联想。他还在《申报》上为自己登求职广告，其实他当时因帮编《金屋》，并未失业，这只是自欺自慰。1999年1月13日，在第二任妻子去世两年后，百岁的他在《申江服务导报》上登出征婚启事，轰动全国。不久果然觅得一位女士，章克标为她取名林青，共同生活了8年。

章克标附逆后隐居十数年，之后一直籍籍无名，80岁以后被重新发现，百岁再婚，105岁加入中国作协。章克标言辞非常风趣幽默，凡访问他的人都对这一点印象深刻。他对当代平暴论的现代作家们的评论也很有意思。当然有不少人问他长寿秘诀，答曰常年喝茶。



章克标译作《菊池宽集》(民国十八年,开明书店)



朱晓果作品



# 科幻文学的拇指

□王晋康

科幻文学是文学，又不全是文学。文学的源头是生活，而科幻文学除此而外另有一个源头，那就是科学。科幻作家(主要指硬科幻作家)的写作，除了再现生活外另有一个追求，那就是理性的探索，诸如：什么是宇宙的本元?宇宙为什么有这样精巧的普适的秩序?它是如何产生的?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理性的诉求本不该出现在小说中，至少不应成为小说的主体，但这些年人们嗜痂成癖，孜孜以求。在主流文学批评家眼里，也许这种现象不可理解，但这正是科幻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

注意，说它是“优势”，而不是“劣势”，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大自然的机理本身具有足够的震撼力。

我的中篇科幻《豹》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生物学家谢教授把猎豹的基因植入儿子谢豹飞的体内，使他成了短跑超级天才。但月圆之夜他的兽性发作，咬死了恋人田歌。田歌的堂兄田延豹为妹报仇，当着警察的面杀死了他。

在法庭论战中，田延豹的律师出奇兵，说当事人虽然杀了谢豹飞，但未犯“杀人罪”，因为谢不是人，哪怕他体内的猎豹基因只占全部基因的万分之一。他说，我想请博士的检察官先生回答一个问题：你认为当人体内的异种基因超过多少他失去人的法律地位?千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这次田廷赛的百米亚军说得好，今天让一个嵌有万分之一猎豹基因的人参加百米赛跑，明天会不会牵来一只嵌有万分之一人类基因的四条腿的豹子?不，人类必须守住这条防线，半步也不能后退，那就是：只要体内嵌有哪怕极微量的异种基因，

# 科幻文学的拇指

这篇单线小说，但实际上另有一条线，科学之线。两条线：故事线和科学线，有交集吗?有。那就是两者都在阐释同一个自然机理：熵增，熵增定律说的是：宇宙将从有序状态不可逆转地转化为无序。小说中两条线互相呼应。物理学上的熵增是主线，而社会学上的熵增只是它的投影。这是一篇纯物理题材的小说。这在主流文学中是不可思议的，但科幻文学就能出现。

所以，读完《黑钻石》而没有意识到“熵增”这个概念的，肯定没有读懂。那么，这样的物理题材小说有感染力吗?答案是：对大多数读者没有，但对某些读者有，即那些理性思维较强、并且有相应知识基础的读者。罗素关于熵增定律曾悲怆地写道：“一切时代的结晶，一切信仰，一切灵感，都要随着宇宙的崩溃而毁灭。人类全部成就的神殿将不可避免地埋葬在崩溃宇宙的废墟之中。”凡是知道熵增定律并持有这种悲怆感的人，就能轻易读懂《黑钻石》。人类至美的代表——钻石——却原来和宇宙中黑暗面的代表——黑洞——只有一步之隔，这样的文学设计具象化了，把玄虚的悲怆具体化了。

我在本文中只列举了个人的作品，只是为了方便。实际上，这类作品在科幻小说中不少，可以形成一个门类。这类以科学探索为核心的小说，由于先天的原因，一般都是小众的，如果它大众化，那常常是其他因素起了主导作用。但尽管如此，它仍是科幻文学的骨架，是科幻文学绵延百代而不绝种的力量所在。一则欧洲的民间故事说，大力士的力量在拇指；而极大，自然威力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应该就是科幻文学的大拇指，是它独有的原力。

作用是：遗传病基因就能够逃过自然之筛而留下来，从长远上说将威胁整体的繁衍。那么该怎么办?没有办法，两者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我们只能沿其中一条路——科学之路——往前走。哪怕它永远含着致命危险。书中有这样的话：“上帝只关心群体而不关心个体，这才是上帝大爱之所在。”这句话是小说的眼，是进化论的文学表达。读完这篇科幻小说而没有记住这句话的读者，说明他没有读懂。一般而言，在主流小说中，单对哲理的阐述不足以构成小说的框架，但在科幻小说中则可以。因为它的阐述是真正的自然机理，这些机理精巧严整，浑然天成，放之宇宙而皆准，有足以震撼心灵的内在力量。比如上例中，当你真正读懂了这句话，你就能理解生存的残酷、悲壮、无奈和昂扬，你会听到一曲苍凉辽远的生命之歌在心中奏响。它也是一曲英雄交响曲，是一曲命运交响曲。

另一篇拙作《黑钻石》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科学家夏侯无极的妻子袁心佩服丈夫的天才，默默支持他的研究，对他感情上出轨尽量隐忍。夏侯无极的研究题目是用超高压来制造钻石。他精益求精，没有料到压力最终超出了临界值，把钻石压成了一个微型黑洞。这个微型黑洞将悄悄吞噬地球。而在此时，妻子的隐忍也到了极限，最终爆发，年轻漂亮的情人戴着那颗黑钻石死去。依主流文学评论的标准，这应该

元朝人张养浩(字希孟，号云石；1270~1329)为后人所知，大约主要因为他有著名的散曲集《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小令161首，套数2篇)，在文学史上有相当的地位。其实他更大的贡献在于一生当官非常忠诚尽责，还写过三本很重要的小册子：《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和《庙堂忠告》，就基层地方官、纪检监察官和朝廷高官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分别作出论述，乃是传统文化中正能量的一位重要代表。他的这三本书，曾编进《四库全书》，在老商务影印的《四部丛刊》中也曾收入。

张养浩最后是为公事积劳成疾以身殉职的。天历二年(1329年)，陕西在连续四五年大旱之后继续面临干旱，“不雨，大饥，民相食”(《元史·文宗本纪》)，朝廷特别起用辞官归隐业已七八年之久的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去赈灾，养浩“既闻命，即散其家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灾民，终日无稍息。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元史·张养浩传》)他那三本为政忠告是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他早年任堂邑县令，后来当过监察御史，最后升迁到“皇家办公厅”(中书省)任职；他的种种忠告都有实践基础，同一般常见的空头理论、官样文章不同。凡是他希望一般官员应当做到的，他本人真能做到。由这样的好官提出种种忠告才有价值，也才能服人。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应躬行。《牧民忠告》强调要爱护百姓，绝对不能贪污，其中《戒贪》一条写道：

人既受命以牧斯民矣，而不能守公廉之心，是不自爱也，宁不为世所诮耶!况一身之微，所享能几，厥心溪壑，适以自贼，一或罪及，上孤(辜负)国恩，中貽亲辱，下使乡邻朋友蒙羞包羞；虽任累千金，不足以偿一夕缢细之苦。与其成于已败，曷若严于未然。嗟尔有官，所宜深戒!

道理讲得很朴素，很实在。书中又指出，直接管理百姓的基层官员特别要管好亲属，《禁家人侵逼》一条前半云：“宦官不能背青白者，率由家人喜善好侈使然也。中既不给其势，必当取于人，或营利以侵民，或因讼而纳贿，或名假贷，或托姻属，宴饗征逐，通室无禁，以致动相掣肘，感无所施。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由是而坐败辱者，盖骈首踵也。”管不好家里人身边人，自己必将跟着出问题以致垮台。这些都是有所见而发的言。

一方面是民，一方面是己，张养浩强调一定要处理好其间的关系。他本人一向非常关心民间的疾苦，曾在著名的《潼关怀古》(中吕·山坡羊)中写道：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首曲子大约作于他去世前不久在陕西赈灾之时。他一方面深感百姓之苦，一方面又痛感朝廷上仍然歌舞升平，大兴宫室，据《元史·文宗本纪》载，本年鲁国大长公主营造宅第，每次拨给钞万锭；张养浩一再请求增拨赈灾款，最少30万钞，而朝廷只勉强拨给14万。张养浩在作品里特别提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固然是怀古，恐怕更是伤今——你劳民伤财修建那么多宫阙宅第，最后到底有什么用处?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尤为伤心而且见道之言。天下虽有种种变化，底层的老百姓总是最苦的。这是十分深刻的观察与感慨。无可奈何的叹息，固然流露了元代散曲家中常见的虚无情绪，但张氏对于人民大众的深刻同情是真诚而伟大的。惟其如此，他才会那样认真严肃地对官员们提出种种忠告，试再读他另一首《山坡羊》：

休学谄佞，休学奔竞，休学说谎言无信。貌相迎，不诚实，纵然富贵皆侥幸，神恶鬼嫌人又憎。官，待恁生；钱，待恁生!

“待恁生”就是“那又怎么样”的意思。张养浩认为一味迷官弄钱并没有什么意义，一个人要想“神恶鬼嫌人又憎”了，即使大富大贵又有什么意思!

张养浩一方面勤勤恳恳地做一名好官，一方面也深知当时官场的腐朽与黑暗不易解决，其《庙堂忠告》最后一节说到“自古忠直为国者少，阿容佞倖惟己之者多”，于是不免觉得世事已无可为，而且无可奈何。中国古代许多正直的士大夫可以为民请命，可以鞠躬尽瘁，但他们内心深处往往有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和痛苦，于是有时就会不期然地逃向消极和虚无。他们的人格是分裂的，张养浩也有这样的倾向，所以曾经辞官归隐；但他到底是一个儒家君子，所以在国家有难的时候仍然应命而出，舍己救人。

正是这样高尚的人格，使张养浩的创作达到了元代散曲中一个新的高度。



# 张养浩的三种「忠告」

□顾农